

以问题意识引领年鉴理论研究

徐佳佳*

摘要 当前,我国年鉴理论研究中面临碎片化、实证化等趋势,基础理论研究滞后于年鉴实践发展。其根源在于当前我国年鉴理论研究中普遍缺乏问题意识。这与我国年鉴受传统史学等治学思路影响,年鉴研究范式尚处于探索阶段以及一些年鉴研究者缺乏学术训练等因素有关。树立问题意识,积极开展元理论、交叉学科以及中外年鉴比较等理论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处理好问题与材料、理论方法、学术规范、实践研究、年鉴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等关系问题,可以为解决年鉴发展中的现实难题及促进年鉴理论水平提高提供一些方向和方法论。

关键词 年鉴理论 问题意识 学术规范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年鉴事业快速发展。实践的发展伴随着理论研究的进步,近四十多年我国年鉴理论研究迈向了一个新阶段。但在肯定这些进步的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年鉴理论研究中仍存在的问题。虽然年鉴学术研究的论文层出不穷,但年鉴学的实质性进展却十分缓慢,年鉴理论研究滞后于事业发展。这种滞后的研究局面使得年鉴理论研究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与当前年鉴的蓬勃发展实践并不匹配。

一、年鉴理论进步需要树立问题意识

当我们在盘点过去的研究成果时,就会发现学术繁荣的背后常常是知识和思想的苍白,尤其是当前年鉴研究中长期扎堆关注年鉴编纂的具体现象问题,造成研究选题缺乏新意;而大量类似研究又造成年鉴研究中呈现的碎片化、实证化趋势,对年鉴编纂和年鉴事业发展现象总结、阐释过多,对年鉴基础理论探索偏少,年鉴学构建的基础理论原理以及规律、年鉴系统理论概念构建等研究偏弱。

这些问题的产生,在根源上都与当代年鉴研究中普遍缺乏问题意识有莫大关系。当代学术研究中,“有没有问题意识”或者说“问题意识的缺乏”已经成为衡量研究水平的重

* 徐佳佳,女,江西省九江市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方志学。

要参考。许多事实也证明,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① 所有的问题均源自于思考,能否对年鉴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仅体现了研究者个人的研究能力,更能够侧面反映出整体年鉴研究是否具有创新发展状态。当前仅对年鉴编纂过程中的材料和现象进行收集和整理的研究现象,不仅反映了研究者在思考上的怠惰和乏力,还引导着年鉴研究朝着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方向发展,造成年鉴与现实发展需要之间的脱节,更会影响年鉴理论研究过程中对于年鉴基础理论难题,包括年鉴属性、功能、传播、变迁等规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长期下去,将直接制约年鉴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而相反,在年鉴理论中树立问题意识则可以帮我们解决许多研究问题。

(一) 树立问题意识有助于增强对年鉴理论的判断力

比如,在年鉴的价值和作用问题的探讨中,许多学者认为年鉴应该严肃庄重,以为政府和研究者提供信息决策为主,并不赞成年鉴走向市场。而一些学者则认为年鉴应该走向市场,成为大众普及读物,为普通读者服务。但如果我们秉持问题意识的思维,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年鉴的发展史,就会明白现代意义上的年鉴源自于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历书、占卜以及航海等实用工具书是年鉴最早的雏形,年鉴天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读者群体也是很广泛的。而晚清时期年鉴传入中国,并在民国时期逐渐本土化,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年鉴,无论是《申报年鉴》,还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等,都以发挥年鉴实用价值为己任,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开展年鉴的营销。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年鉴是否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进行发展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其关键还在于如何看待年鉴的作用,如何定位年鉴的价值。正是问题意识引导我们去透过问题的表象,反思问题的根源,理解这一点,就为当代年鉴如何确定服务对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树立问题意识有助于年鉴理论升华

一些年鉴研究者在从事年鉴理论研究时偏重于年鉴编纂实务的研究。尤其是在对中国当代年鉴中的地方综合年鉴的评价中可看出具体编纂水平的高下,并据此作出价值判断,较少将这些年鉴置于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研究和考察,缺乏对同一历史时期年鉴的横向比较和辨析。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对一本年鉴仅限就事论事的品鉴,应当多层次、多角度理解其产生、发展的过程。比如在评价一部地方综合年鉴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其放置在国外同类年鉴、国内同类工具书中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国内的地方综合年鉴具有的工具书属性是在增强还是削弱,年鉴是朝着通俗化的普及读物还是专业化的工具书方向发展,带着问题意识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透过年鉴编纂出版的现象,透视我国当代年鉴发展的规律和变化。

因此,能否用问题意识引领年鉴理论研究,对于当代年鉴理论研究能否推向深入,年鉴学科能否建立以及我国年鉴事业未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欧阳辉:《理论创新要有问题意识》,《人民日报》2016年7月19日第7版。

二、当前年鉴理论研究中问题意识缺失的几个原因

造成当前我国年鉴理论研究中问题意识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从问题意识是什么开始。现代学科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研究从而掌握事实背后规律以及“真相”。树立问题意识是其最重要途径和普遍方法。问题意识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其本质来源于对某一理论、现象或者常识的质疑和反叛。一个久久困于心中的疑惑,一个研究者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研究问题的起源或一次学术研究的开始。学者黄宗智就说过:“今天回顾,我清楚认识到学术研究也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其中的关键也许就是个人心底最关心的问题。”^①它引导着研究者从发现问题出发,以学科或学术范式研究及研究线索梳理为基本内容,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材料或者佐证问题的证据,从而得出结论。问题意识要求解决“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的问题。它要研究者带着问题去寻找材料,组织论证。这种研究引导和帮助研究者跳出现象的包围,接近事实的本质。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必须要从“质问大自然”开始,哲学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因此,坚持问题导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②而这种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擅于运用理论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的研究正是目前我国年鉴研究普遍缺乏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受传统考据治学思路影响

有无问题意识是现代学术研究与传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区别。在我国传统文史研究,尤其是古典文献和历史研究中,大多遵循着从事实和材料出发,通过材料考辨、原典和证据的考据来厘清问题的研究路径。这种占有大量材料的研究当然是一种研究的基本功,但这种基本功并不等于研究本身,更不能完全代表研究的水平。因为年鉴研究内容与传统史学、方志、古典文献学等相关学科存在相近的地方,这类学科采用的传统研究方法对年鉴研究者的研究思路有较大影响。

当前考据类研究思路和方法在年鉴研究中很普遍,许多文章正是遵循或者暗合了这种研究思路。一类是旧籍材料考证文章,这类文章正是通过占有一些新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但较少研究的古籍或者资料,对这类资料进行考辨和证明,从而厘清其中一些材料。如中国古代典籍中从宋明清到民国时期年鉴类(与现代年鉴有较大区别)典籍的研究和考据等就属于这一类。这类文章一般从古代典籍中一些类似当代年鉴的条目或者章节,或者一些类似现代年鉴框架的古代典籍出发,辨析该文献是否是我国年鉴的起源。作为年鉴领域典型的考据研究,这类研究体现了研究者爬梳古籍文献的基本功,但其对于年鉴思考缺乏整体思维,没有从年鉴世界史的发展角度考察问题,套用现代概念解释古代典籍,在本质上还是缺乏问题意识所致。另一类文章是当代年鉴编纂经验研究。这类文章一般从

^① 黄宗智:《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② 周明生:《提倡具有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光明日报》2006年12月4日第7版。

当下的年鉴工作出发,将年鉴编纂、年鉴事业发展出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整理,有的还会将这些事实与已有的常识或规律进行辨析,然后厘清事实。这类文章从年鉴编纂实务出发,对某一具体编纂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但容易就事论事,得出的结论、总结的经验离开一部年鉴就不能适用于另外一部年鉴。出现这种问题的本质还是研究者陷于材料整理,较少透过单一的现象看到整体年鉴的发展规律。可以说,这两种研究都停留在研究的观察阶段,没有从观察中提出问题,也没有真正进入理论研究阶段。^①

综上,我们可以明白,材料考辨、原典和证据乃至经验的收集和总结是我们做好年鉴理论研究的重要基本功或者前提。但这些基本功并不等于研究本身,而只是研究的基础或者准备阶段,我们的研究应该通过收集到的典籍或者经验材料,以哲学、历史或者其他理论的视角,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本质和规律。

(二) 年鉴学研究范式和学科体系尚未健全

当前,我国年鉴研究中缺少问题意识,还与我国年鉴研究中缺乏广泛的理论运用和思辨有关。这一点与当前我国年鉴学没有建立规范的学术研究体系和研究范式有很大关系。年鉴理论研究应该如何展开,年鉴理论研究中需要用到哪些基础理论,或者可以通过哪些理论对年鉴展开深入研究,年鉴理论研究中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突破等,这些都没有一定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年鉴理论研究者只能根据自身的治学背景和学术经验,采用相近学科的研究范式,探索性地开展研究。

回到年鉴的研究中,晚清时期年鉴引入中国之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既受到我国古代方志、史学、文献学的影响,在编纂思路和方法上,大量吸收方志经验,又受到现代统计学、新闻和情报学等多种现代学科的影响,在内容和出版形式上兼具西方工具书属性。在当代,由于年鉴的出版物属性,年鉴发展又受到出版市场流变的影响和制约。在年鉴受多学科影响的背景下,年鉴学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何种研究方式、研究思路乃至如何确定研究重点都存在较大分歧,影响了年鉴学学科体系建立。

作为当前地方志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方志学同样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年鉴学一样面临着学科研究体系没有健全而产生的研究困境。由于我国方志学研究在编纂思路、治学路径等方面一直以传统史学为重要参考,史志不分家的观念使当前一些方志研究者把方志学当做中国史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现代方志研究朝文献考据方向发展,普遍缺乏现代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方志研究的现代化研究阻力重重。因此,带着问题意识,从当代年鉴发展的难点和现实困境出发,逐步建立具有当代学术研究特点的年鉴研究范式和思路,对于解决当代年鉴研究困难是很有必要的。

(三) 年鉴理论研究队伍普遍缺乏学术训练

目前学术研究中出现较为明显的学院化和专业化趋势。^② 各学科中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者。这类人员大多接受过较为完整的学术训练。而目前从

^① 韩民青:《深化理论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5年4月12日B1版。

^② 祝帅:《作为学科的广告史——发展、个案及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页。

事年鉴理论研究的人员大部分来自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只有少量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来源广泛,其中接受过完整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员并不占多数。根据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2019年公布的《全国地方志系统工作机构情况统计表(2018年度)》看,在编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平均每个单位为21.9人,博士学历平均每个单位0.069人,硕士学历平均每个单位1.67人,本科学历平均每个单位14.15人,大专学历平均每个单位5.55人,高中及以下学历平均每个单位0.69人。^①正因为缺乏学术训练,不仅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等,一些研究者对于引文、参考文献以及其他数据和格式的使用都有不合学术规范的地方,影响年鉴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学历只是影响研究者学术素养的一个方面因素,地方志工作机构中大部分研究者学术背景比较杂,在从事地方志研究前专业学习过地方志理论包括学术史等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大多数从事地方志研究的人员都只能结合以往学习背景,开始跨学科研究,这也给年鉴学术研究带来一定困难。

此外,年鉴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年鉴研究者一般同时还从事编纂工作,因此造成一些研究者埋首具体编纂工作,对于理论的认识和运用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不擅于提出和解决理论问题,造成问题意识的缺乏。黄宗智说过:“在1972年获得加大终身权以及伴之而来的事业上的安全感之后,我便有强烈的冲动要凭借自己的专业训练(扎实的经验研究),试图通过学术为内心的矛盾追求答案。”^②可见,加强学术训练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学术训练是通向现代学术大门并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只有加强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思考,才能真正促进理论水平的提高。

三、年鉴理论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来源

那么,在年鉴理论研究中如何强化问题意识,或者说年鉴理论研究中从哪些方面出发,可以更好地树立问题意识?大致来说,这离不开研究者长期的理论积累和对现实的关注。同时需要研究者敢于去直面和解决年鉴理论发展的基础难题,拥有对年鉴理论研究和发展的责任和担当。具体来说,可以从加强和做好以下几个方面来强化问题意识。

(一)年鉴元理论创建和研究

元理论是支撑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是学科理论发展的最高概括,也是支撑学科研究的基石。年鉴学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理论研究进展缓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支撑年鉴学发展的元理论研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这是目前年鉴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课题之一,也是值得不断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树立问题意识,更需要和问题意识的指引下,充分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年鉴学的元理论可以怎样尝试研究?元理论可以来自于先

^① 《全国地方志系统工作机构情况统计表(2018年度)》,2019年4月11日,http://www.difangzhi.cn/zxfw/tjsj/201904/t20190411_4939904.shtml[2020年9月13日]。

^② 黄宗智:《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前理论的突破,也可以来自对其他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尤其对于新兴交叉学科而言,开展跨学科研究,引入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可以为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创建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案。纵观近年来建立的各类新兴交叉学科或取得长足发展的一些学科,都与该学科元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有重大关系。而这些学科元理论的构建大多是基于与其他学科广泛的对话和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比如,近年来随着我国广告事业和全球广告产业不断壮大而在各大高校成立的广告学,正是借鉴了历史学、传播理论、语言学、市场营销、跨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基础理论才取得了本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才被逐步认可为一门较为独立的学科。尤其是当下广告学开展的本土化研究,正是基于萨皮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等语言学基础理论展开研究的。正是问题意识让我们认识到了跨学科发展的可借鉴性,才让我们找到了解决相关问题的办法。因此,年鉴研究中元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亟待我们解决的重要问题,而问题意识则引导我们去寻找合适的解决途径,因此问题意识和元理论问题的解决是相辅相成的,对彼此都十分重要。

(二) 年鉴传统理论辨析

这种疑古的研究思路是树立问题意识中经常采用的形式和做法。它就是针对已经存在的理论、现象等进行质疑,通过大量的论证,举例和说明,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结论可以是对以往理论、现象等的否定,也可以是一种新话语语境和背景下的理论发展或补充。古今之辩在我国学术史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从诸子百家到民国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思路都曾促进过当时的学术研究和发 展。民国学术研究中,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基于民国时期鼓励学术创新而提出的,通过呼吁学者们对于旧有理论的怀疑和推翻,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民国时期许多思想较为激进的学者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开展了一些的“疑古”研究,比如历史学领域的顾颉刚、文学领域的钱玄同等。当前,我们的年鉴理论正处于构建过程中,随着年鉴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年鉴理论也应当适应这种变化而做出调整。其间,旧有的传统观念不能适应新的年鉴事业发展,从而对旧有的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和补充,甚至是重建都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种研究方法需要避免走向怀疑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因此,我们对旧有理论的辨析应当建立在充分和扎实的论证基础上。

(三) 年鉴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也是帮助研究者认识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它通过典型个案的微观研究来否定或肯定其背后的发展逻辑,也是树立问题意识的一种方法。在个案研究的过程中并不需要设立宏观的理论框架,而是聚焦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在历史研究中,个案研究非常普遍,尤其针对某一古代典籍或者艺术作品展开研究十分常见。这个研究过程需要围绕个案研究对象查找较多资料,但它的研究重点不在于资料本身,而在于展示个案背后的完整逻辑,与传统史学单纯积累和辨析材料有明显的区别。个案研究为年鉴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即从微观研究中透视年鉴发展的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

个案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古代的某一类似年鉴作品,也可以是当代国内外年鉴著作。随着当今全球年鉴事业的快速发展,年鉴产品、年鉴新现象层出不穷,年鉴个案的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因此,在问题意识的指引下,广泛涉猎古今年鉴发展史,关注当下年鉴发

展动态,从中发现问题,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问题进行探索和辨析对于推动年鉴理论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四)年鉴知识考古

知识考古学是法国社会学家福柯首先提出来的,他采用考古的办法梳理人类知识历史。他的观念对于传统的欧洲宏观史学产生了质疑,建立了一种对人类历史的新理解,对后世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种“观念先行”的研究方法也是从发现问题出发,先提出观点或假设,然后通过大量的论证,重构理论。这一点有别于从现象着手的研究。我国当代年鉴理论体系的构建可以借鉴这种方法论,通过对古今中外年鉴发展历史的重新整合,来重新定义和解释年鉴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不过,采用这个方法需要研究者对于理论和实践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并且有大量的论证和材料佐证,否则得出的结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就会变成僵硬的“生成理论知识”而被淘汰。

总之,树立、强化问题意识虽然有一定的方法可取,但是仍然离不开研究者平时的知识积累和学术训练以及对现实的关注,因为问题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处理好年鉴理论研究中的几个关系

问题意识本质上遵循的是“无罪推定”原则,这种理论引进自法律界,是对过去或者现存的说法、理论、现象等,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或论据进行证伪的情况下,选择疑罪从无,只有找到足够的、能够推翻或者证明现有或者之前说法、理论、现象的理论和事实依据,才能够得出结论的一种研究思路。这种理论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论证。因此,在论证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问题和材料的关系

论证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用到大量材料。如何处理好问题和材料的关系,避免我们的文章走上只谈材料,看不到问题的情况出现?我们首先应当明白我们年鉴理论文章是写给谁看的。按照现代学术的预设,理论研究不是科学普及,而是写给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的人看的。因此,我们研究文章不应该把一些常识性的材料大篇幅放在文章中,或者重复罗列一些文件讲话和不证自明的道理,而应该紧紧围绕我们要阐述的问题,进行材料的选取和组织。

问题意识需要我们带着问题去找材料,同时要理解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能为问题服务,也并不是所有找到的材料都要放在研究论文中去,就好像一个裁缝有很多的布料,但是做成一件衣服却不需要用所有的布料。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看似用了很多的史料,但这些史料都只是他研究的很小一部分,都是他挑选出来的、对他有利的材料,大量不利于证明他观点的史料都被遗漏或遮蔽了。^①材料的掌握并不是越多越好,只有配合问题使用才有学术价值。因此,是否擅于处理好问题和材料的关系,也是问题意识是否明确

^① 祝帅:《作为学科的广告史——发展、个案及趋势》,第6、17页。

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问题和理论方法的关系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涉及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有许多理论,这些理论对于阐述年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有很大帮助。比如,在艺术史领域跨文化交流中的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相关理论为我们理解我国年鉴本土化提供了不同视野,让我们可以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理解我国年鉴形成自身特点的原因。当前年鉴研究中普遍缺乏理论意识,对于一些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运用和阐释较少,制约了年鉴问题的解决,因此多角度运用已有理论解决年鉴研究问题十分必要。

但理论的运用应当是审慎的,不宜生搬硬套,强行嫁接,造成理论和问题的两张皮。20世纪80年代后,各种国外文学研究方法和思潮涌入我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研究,其中接受美学运用非常广泛。这种美学思想本质上有助于提高接受者也就是文学作品受众的地位和重要性,被我国的一些研究者片面阐释后,造成一段时间内文学文本研究的弱化。因此,理论的运用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坚持科学。

方法论也是我国年鉴研究中普遍缺失的。在人文社科学术长期发展过程中,大致形成了两种方法论:一种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历史主义的思路,通过解释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另一种是以孔德、斯宾塞、穆勒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路,这种论证路径是基于社会统计资料基础而产生的。^①这两种论证模式在现代科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当前年鉴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尤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中的统计法在当前的年鉴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更科学、准确,适合年鉴学的发展。确实,这种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定量研究方法在从事通过一些数据从而得出问题背后的规律相关研究时有其优势。比如针对地方志使用情况,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地方志相关内容的使用频率、人群分布和内容偏好进行统计并得出结论,或者对一些年鉴的某一个具体的问题,如图片、框架数量、网站、数据库建设等进行统计和比较,从而得出相关结论等。但这种研究方法成功与否与量本的选择有较大关系。量本不够,或者代表性不强,或统计设计不合理等都会直接影响统计结果的可信度和价值。而且统计是对某一整体的评价,并不能对个体案例进行较好分析,因此不宜过分抬高统计方法在年鉴研究中的地位。

（三）问题和学术规范、实践研究的关系

在阐释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应当遵循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指超越一切学科独特性基础上的普遍法则,是各个学科在学术研究中都应该遵守的共性。主要包括学术的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具体到年鉴,就包括对年鉴的整理、年鉴理论资料的检索、论文写作以及写作规范的要求,这些都应该按照当今学科的要求加以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年鉴的理论研究。

前文提到一些年鉴理论研究者缺乏学术训练从而影响学术水平提高的情况,除此之外,一些从事具体年鉴编纂工作的研究者还因为习惯于将年鉴工作总结与理论研究混淆,

^① [英]彼得·温奇著,张庆熊等译:《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出现问题意识不强,官话套话过多等影响研究水平提高的情况。

实际上,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两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互为助力的。在社会学、统计学、图书馆学、新闻出版广告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实践研究是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只有从事大量具体的实践才能更好理解和促进理论发展。如积极的新闻学理论研究可以为当前新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的转型和发展提供许多预测性的指导和参考建议,而媒体的实时发展又证明和补充了新闻理论。年鉴同样如此,蓬勃发展的年鉴事业可以为年鉴理论发展提供鲜活资料和时代课题,离开年鉴实践发展,年鉴理论就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年鉴理论的发展又可以解决年鉴事业发展的困境,指导和推动年鉴事业。因此,处理好年鉴实际工作和年鉴理论研究的关系很有必要。

(四)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研究

树立问题意识还可以帮我们较好认识年鉴的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传播,必然会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文化民俗、历史渊源等因素进行本土转化,形成一些有别于他国的特点。年鉴作为产生自欧洲的文化产品,伴随着全球化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各国年鉴根据不同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年鉴出版宗旨、编纂框架、体例以及风格,中国年鉴也是如此。这是年鉴不同于方志、古典文献乃至出版等相关领域的一个重要特点。理解这一点就可以了解到我国年鉴是全球年鉴文化与本国实际需要的共同产物。因此,年鉴理论研究离不开海外年鉴的研究,更离不开对年鉴本土化历史经验的借鉴和世界年鉴发展史的思考。如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民族化和本土化并积极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一样,年鉴被引入中国后也应当根据国内外经验更好进行本土化和大众化,并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而近三四十年比较学的兴起,各学科都竞相运用比较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建立比较年鉴研究这一年鉴理论研究的分支,通过中外年鉴比较,掌握年鉴事业的发展规律,也成为解决年鉴理论问题,促进年鉴发展的一个尝试。

五、结 语

树立问题意识可以让我们对年鉴的理论研究突破经验的局限,在年鉴学受到多学科复杂影响下依然能够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为年鉴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有针对性、建设性的理念和路径。这不仅需要年鉴研究者个人付出艰辛的努力,还需要科研院所和年鉴编修机构创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只有高度重视理论研究,才能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解决问题,真正推进年鉴的实质性发展。

责任编辑:冷晓玲 宿万涛